

# 左右不分還是左右有別？ 政黨政治與婦女政策

陳芬苓

## 壹、前言

一項社會福利政策的出現，往往與社會、政治、經濟等環境有關，在現代福利國家中，不同政黨的意識形態政治主張會影響他們治理國家時社會福利的走向。而婦女政策亦是如此，雖然每個國家的性別文化是一樣的，但是不同的政黨對於性別角色扮演、家庭制度走向、兩性勞動力運用的策略，具有不同的意識形態，也會造就他們婦女政策走向的差異。本文中會先探討不同福利意識型態可能產生不同婦女政策的走向；再介紹女性主義不同派別如何看待國家扮演的角色，以瞭解右派及左派女性主義是否信任政府，如何看待國家政策對性別平等的意義。最後，以臺灣近年來的婦女政策為例，討論政黨政治在臺灣的發展，是否符合傳統福利意識型態的假設，及女性主義的主張。期待福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能使我們更瞭解社會工作

與政治之內涵。

## 貳、福利意識型態下的婦女政策

Titmuss（1974）指出福利政策是脫離不了價值及意識型態的。社會福利政策包含許多社會目的及選擇，不可能完全價值中立，依照社會福利發展的歷史，不同的觀點也呈現出不同的福利意識形態。如右派、新右派及自由主義，便認為國家不應該過度干預自由市場，只有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之下福利國家才應該要介入。他們相信福利政策過度的干預會破壞傳統家庭價值，影響社會秩序、削弱個人對自己的責任、造成個人與家庭對社會的依賴。因此，主張政府應該要維持小政府的狀態（George & Wilding, 1994）。在此意識型態下政府會偏向提供選擇性（selective）的福利或殘補式的福利，以資產調查

(mean-tested) 的方式限制只有在家庭及個人經濟不佳而失功能的情況下，政府才會介入給予補助（而且傾向現金福利而非提供服務）。在自由主義的主張下，所發展出來的婦女政策，可能偏向保留傳統家庭照顧的責任，但會鼓勵發展市場照顧機制，女性可以選擇就業但要自行去市場選購替代性照顧服務；無能力購買市場服務的家庭，則可選擇由女性在家自行照顧，大部份情形政府不會給予家庭支持，只負責監督市場品質。右派政府不主張發展弱勢者福利依賴的政策，相對縮減單親家庭及有幼兒家庭的家庭津貼政策（Ellison, 2016; George & Wilding, 1994）。

左派或社會主義的觀點對於福利國家是懷疑的，他們認為福利國家是政府為了達到政治性的手段，鞏固當權者或資本階級的執政基礎，為了消弭當時群眾的不滿所提出的，福利其實是「包著糖衣的毒藥」，只是政治的工具而已，並非為人民的需求而生。因此抱持此意識型態的政府會相信集體主義的力量，並且希望透過國家的干預能進一步改善市場力量的影響，也會提供較為優渥的社會福利津貼，走向大政府型的福利型態（偏向普及性福利及提供實物福利的方式，因為不相信市場機制）。在社會主義的主張下，所發展出來的婦女政策，可能偏好削弱家庭在照顧責任上的角色，認為公共照顧系統可以取代家庭功能，才讓女性更自由選擇走入職

場；並可接受多元家庭及不同型態的家庭組合（Dean, 2016）。

Esping-Andersen（1990）以去市場化及階層化為指標，將所有福利國家典範分為三種類型，透過這樣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不同類型的福利國家會發展出不同類型的婦女政策。第一種類型自由主義體制強調以資產調查的救助為主，福利主要是提供給具低收入戶福利資格者，條件相對嚴格，比較強調依市場的機制提供福利，央格魯薩克遜國家為主。在這樣的福利體制中，家庭擁有的公共支持最低，家庭依收入不同自行去市場購買不同程度的照顧服務，女性受到的支持有限。第二種類型是統合主義福利體制，受教會的影響，一方面重視以工作取得福利，會建置完整的職業保險福利機制；另一方面強烈主張家庭必須維持傳統的性別分工，但是會發展家庭津貼鼓勵女性留在家中照顧，公共托育及家庭服務發展程度較低，只有當家庭失去照顧成員的能力時國家才會介入取代，這類型國家以歐陸國家為主。第三種類型是社會民主主義福利體制，以全民充分就業為目標，重視國家在照顧上的責任，主要發展普及性且高品質的福利服務，所有福利服務以去商品化為原則，但為了維持高品質的福利國家，稅收必須增加到最大，其代表的國家以北歐國家為主（Sainsbury, 1999）。

除了上述三種類型之外，學者普遍認

為東亞地區的福利體制難以歸類到上述三種模式。因此，Holiday（2000）提出：東亞地區的福利模式為生產型福利國家，國家的主要任務為經濟發展，社會福利只是促進經濟成長的工具，在這類型的國家中所選擇發展的福利往往與有利於經濟發展為主，例如，發展高品質且價廉的教育體制，是為了培育高品質的勞動力；而發展普及性的健康保險，也是為了維持勞工的健康才能投入經濟的發展。臺灣、新加坡、香港、日韓都被歸類於這類型的福利體制。在這種類型的國家，如何讓女性成為勞動人口的婦女政策會較易推動，所有婦女政策的評估指標也在於是否可以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而不是在女性權益或兒童福利的考量；但女性往往只被視為產業後備軍使用，且只能填補資本主義發展下低薪、低階或兼職的次級勞動力市場的工作。

### 參、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

在討論婦女政策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時，也必須帶入女性主義的觀點；因為政府中主導婦女政策的政策顧問，可能包含不同派別的女性主義者，她們所建議的政策走向也會因為意識型態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政策走向。許多女性主義學者對福利國家的角色是持懷疑的態度，也認為現有

的福利國家傾向於強化婦女的依賴角色，控制婦女使她們能夠待在私領域的範疇（Hernes, 1989; Wilson, 1977）。現代福利國家仍然深受貝佛里奇（Beveridge）式福利制度的影響，將男性與女性角色在福利政策上二分化，在貝佛里奇的設計中，一個家庭以男性為主，女性往往以附屬者身分加入福利政策的服務中（Beveridge, 1942）。女性往往需要以依賴者或配偶的身分去取得福利，而無法以個人公民權的方式獲得，使得女性必須依附在婚姻中才不會失去福利的保障（Chen, 2014; Lister, 2003）。馬克斯主義學者早已批判社會安全制度的設計事實上是重複地剝削薪資較低的勞動者，加深勞動力市場上強勢與弱勢勞工的差距；在職場上處於弱勢的女性勞工，在現代以職場功績為主、以薪資水準為給付標準而設計的社會保險制度中，更容易受到雙重的剝削（Pascall, 1997, p. 199, 2012）（註1）。Bryson（1992）批評各項以工作人口為主的各項社會保險方案（含退休金制度）是一個男性福利國家的產物，尤其是社會安全制度中存在著某種性別陷阱，使女性容易落入貧窮。MacDonald（1998）指出，勞工保障制度雖然都以「性別中立」的語言呈現，但實質上卻是以男性工作者為目標對象所設計出來的制度。

就女性主義而言，究竟「國家」（state）是複製及維護父權主義的工具，

或是可實現性別平等的工具？各派女性主義者各有其看法，但基本上各派別的女性主義對「國家」抱持懷疑的態度。自由主義學派女性主義認為透過國家機制中法律及制度的改變可達到社會中兩性平等的目的，認為國家應該保障男女有平等的機會在社會中發展（Chen, 2000; Walby, 1986）。

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者對國家機器的分析著重在其資本主義的性格，認為資本主義中階級間的分化是有助於資本累積的，因此維持男性在公共領域中（含國家之運作）的獨占地位，將男性視為資本主義中生產的主體而壓迫女性之地位，是有助於男性團體對資本主義社會之認同。因此以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的觀點，國家是資本主義的走狗，所有福利服務都只是為了達到資本累積的目的，使女性更加依賴男性或國家，是一種社會控制（Chen, 2000, p. 31; George & Wilding, 1994）。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在解釋職場上性別差異時便使用「產業後備軍理論」（reserve army theory），該理論認為男性擁有生產的工具為勞動市場中的正規軍，而女性被視為只是補充性勞力，女性主要角色在家庭產業缺人時再當補充人力就好。另外，他們也認同「雙元勞動市場理論」（Dual Labour Market Theory），認為職場上會分為兩個不同的區塊，一塊是核心市場；另一塊則是邊陲市場，該理論發現女性多

在邊陲市場中工作，而男性則多在核心市場中工作；因為男性主管的文化，使得男性較容易進入核心市場，而在邊陲市場工作的勞工會有較低的升遷機會、福利條件及薪資水準，而在訊息的取得上也會較差、進不了決策階層，也較難從職場上獲得成就感（Walby, 1990）。

基進女性主義者則認為國家機器是維持父權主義的共犯，國家常拒絕提供婦女有效的支持網絡；基本上國家機器傾向於維持一種以男性為主宰的社會結構，因此主張唯有建立以女性為中心的社會制度才能去除男性壓迫女性的本質。社會主義學派女性主義者強調資本主義與父權文化同是壓迫女性的根源，認為國家機器運作的目的是為了維持「家庭制度」，因此所有的政策的最終目的都傾向於保存原有「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Walby, 1990, pp. 140-142）。有別於其他派別對於國家角色的懷疑，社會主義學派女性主義認為：婦女團體對於福利的爭取有助於女性參政，而藉由女性參政可使得國家發展對女性有利的政策，使國家成為爭取女權的工具（唐文慧、王宏仁，2004；Siim, 1990）。

因此，究竟國家政策是基於保護女性再生產角色或是保護「女性勞工」本身？國家福利政策是為資本家使用勞工的彈性而設想，亦或真的為了保護女性勞工工作權？在本文中，我們以臺灣過去在勞工政



策與家庭政策中，政府對女性角色的意識型態即可做有意義的探討，更深層的去看法政治如何「做性別」（doing gender）。

## 肆、政黨政治與福利政策

不同福利國家理論對於福利興起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釋，例如聚合理論（Convergence theory）認為：工業化的結果一定會帶來社會福利的興起，工業化程度越高，社會福利制度會越先進（Pierson, 1991）。文化決定論（Culture determinism）的學者認為文化的意識形態對於福利制度會產生影響（Goodman & Peng, 1996）。擴散理論（Diffusion theory）則認為不同社會國家之間會有互相模仿學習的影響，地理位置相近的國家在福利制度發展上會逐漸形成模仿的結果（唐文慧、王宏仁，2004）。馬克思主義（Marxism）的學者認為國家是資本家的走狗，國家的福利制度只是為了幫資本家服務（Pierson, 1991）。新馬克思主義的學者Ian Gough（1979）則認為資本主義下的工人運動是促成福利國家願意改變的關鍵。

其中，Korpi（1989）由北歐發展福利國家的歷史發現社會民主黨對於福利興起具有關鍵的影響因素，所以認為「政治造就了不同的社會（policies makes a difference）」。Korpi 等人（2009）將國

家分為賺錢者/照顧者取向、市場取向、傳統家庭取向等三種類型，並以18種指標去分析性別平等，發現女性在第一種類型中進入政治的比例較高，在市場取向國家中女性在私領域擔任經理的比例較高。各項指標有高有低，但整體而言，社會民主政黨下發展的福利國家還是會發展較有利於性別平等政策。Huber與Stephens（2000）將國家分為社會民主國家、基督教民主國家、及自由民主國家等三個類型，也確實發現政黨政治及女性勞動參與率相對影響國家是否會重視女性相關的福利。因此，本文採用「政黨政治」（Partisan Governance）的觀點分析臺灣近年來政治與婦女福利之間的關係，了解福利如何受政黨政治的影響。

東亞地區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許多國家在政府主導下快速的投入經濟的發展，而過度威權的傳統政治也同時引發東亞各國國內民主化的需求，在80年代中期紛紛發起民主化革命，隨之而起的是多黨政治的出現。在民主選舉的競爭制度之下，各政黨漸漸採用福利政策作為吸引選票的方法。早期在臺灣所有民主選舉中，統獨議題都是主要的政見。直到1993年地方選舉當時在野的民進黨提出當選後每位老人普發3,000元老年年金的政見，並且在當次選舉大獲全勝利。之後，在臺灣選舉中「福利牛肉化」變成最有效的選舉政見。學者Wong（2006）用「福利主流化

時代（welfare mainstreaming）」來形容臺灣政黨政治這樣的轉變。

## 伍、臺灣政黨政治下的婦女政策

針對臺灣過去對女性就業的重要政策，作者依時間順序整理於表1中，由於各階段新增政策特性不同，也剛好與當時執政黨意識型態有關，以下分析分為1999年以前、2000～2008年、2008～2016年、2016年之後等四個階段來看女性勞動力新增的政策在臺灣的變化。依 Morel等人（2012）的分類，為處理「新社會風險」所產生的社會投資政策，包括積極性勞動

市場政策和家庭政策，因此在表1中同時呈現兩種政策的發展。

1999年前的女性就業政策主要是「家庭即工廠」模式，希望女性的角色以擔任母親為主，但因應經濟發展的需求希望家中的勞動力都能夠發揮剩餘勞動力的價值，最好女性可以一邊擔任母職又同時擔任勞動者的角色。基本上認為女性還是該以家庭為主，工作為輔的思考模式。此階段也提出協助特殊境遇婦女就業，但並未針對弱勢女性就業有特別方案或特別的職業訓練。此時政黨的意識型態符合社會主義學派女性主義者的論點：資本主義與父權文化共同壓迫女性，認為國家機器運作的目的以維持「家庭制度」為主。早

表 1 臺灣歷年新增婦女勞動與福利政策

年份	勞動政策	福利政策 / 家庭政策
1999年前	婦女職訓計畫	1992 年開放外籍看護工（就服法） 1996 年特境生活津貼（負擔家計婦女）
2000～2008年	2000 年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創業貸款） 2002 年飛雁專案 2002 年性別工作平等法 2007 年微型創業鳳凰計畫 2007 年縮減婦女數位落差計畫 2007 年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含二度就業）	2000年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 2006年單親婦女培力計畫（選擇性福利） 2007年協助婦女再就業計畫（針對弱勢婦女） 2007年長照十年（稅收制）

年份	勞動政策	福利政策 / 家庭政策
2008～2016年	2010 年婦女就業促進計畫	2008年保母托育管理與費用補助計畫（選擇性福利） 2008年規劃長照保險（未推動） 2009年育兒留職停薪津貼 2011年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2012年育兒津貼（選擇性福利） 2013年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選擇性福利）
2016年至今	2023年婦女再就業計畫	2018年準公共托育計畫 2019年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 2023年育兒津貼（普及性福利）

說明：各項政策多半有延續性進行，故本表主要呈現為新增政策的時間點。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部分引用陳芬苓（2021）。

期由於臺灣傳統職業訓練以青年人為政策目標，公立職業訓練場所集中訓練時間過長、訓練地點偏遠、必須離家接受訓練等因素，並不利女性參與；晚近為了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特別為婦女設計了以服務業為主、時間較短並且不須全日住宿型的職業訓練課程，也可視為一種標準的社會投資方案。

直到2000～2008年，開始有特別針對婦女所推動的社會投資型方案，主要專注在協助婦女創業，特別是飛雁計畫、微型創業鳳凰計畫，專門以女性為主設計一系列完整的支持性福利，包括：諮詢輔導服務、提供創業課程、微型創業貸款、信

用保證機制、創業陪伴輔導、成立創業同儕成長互助社群等，是少見以女性為主體而推出的政策，也是國內外少見的社會投資方案。此外，也推出具有特色的《縮減婦女數位落差計畫》，此計畫提供婦女基本電腦使用相關訓練，創造婦女社會與經濟方面的多重機會，進而提升其受僱或創業的能力，以中美基金為經費於2007～2012年度計畫終止，亦為一項社會投資型計畫。此階段政策的特色在於：視女性為就業的主體，完全去家庭化，無特別考量女性是否已婚或是否需同時兼顧育兒的角色。

此一趨勢與臺灣自解嚴後所發展的

婦女運動有關，在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後，隨著婦女運動者進入政府角色，不僅於2002年通過《兩性工作平等法》，之後也推出完全以女性為主體的政策。此外，2006年推動《單親婦女培力計畫》，有鑑於女性貧窮人口的主因來自單親家庭，女性因過早進入婚姻或未婚生子，以致於教育程度過低，在失婚後很難以低學歷進入職場並同時照顧幼兒，該計畫補助單親女性先補充人力資本再進入職場，補助弱勢單親婦女就讀大學校院及高中職學費、學雜費與學分費，並補助進修學位期間六歲以下子女的臨時托育費。還有2007年開始的「協助弱勢婦女提早就業」計畫執行至今，為協助弱勢婦女適應職場，辦理弱勢婦女職前準備班，規劃現今就業市場分析、產業發展趨勢、職場適應與協助、顧客服務及情緒管理、人際關係的維持及職場基本應答等課程，由專業個案管理員協助訂定個案就業計畫，模擬面試、陪同面試、安排職業訓練諮詢評估，還包括就業後的職場關懷，以陪同她們順利進入職場，都是針對女性設計的重要政策。

在上個階段的婦女就業計畫著重在要求公部門優先聘用負擔家計者及弱勢婦女，家庭還是以男性為主要養家者（male breadwinner）的概念，並未在改善女性人力資本後才協助女性進入職場。此階段各項協助女性就業政策均是經過完整設計的社會投資型方案，先解決女性人力資本較

弱的現象，以免婦女進入職場只成為資本主義下（低階）勞動力市場的缺口而已（Saraceno, 2015）

在2008年之後，原本只有女性可申請的創業方案改成男女皆可申請，新增政策的走向改為著重在解決就業婦女的育兒問題，特別是開辦育兒留職停薪津貼、提供育兒津貼、保姆補助等方案，希望就業婦女同時兼顧母親與就業的雙重角色與任務，但是似乎隱藏著：女性可以停下就業的腳步，先滿足家庭育兒母職的需要。只是過去臺灣的福利模式偏向以家庭為主的殘補式福利，國家很少介入原本屬於家庭照顧的領域（Chen, 2000），但此階段國家首次開始以現金給付的方式，提供育兒方面的補助，也表現國家願意分擔家庭育兒的負擔，對傳統福利體制而言是仍然一項突破。但當新增政策重點放在育兒留職停薪津貼、育兒津貼時，與Esping-Andersen（2009）所提到之統合主義福利典範相符，希望維持傳統家庭模式，由國家提供福利讓女性暫離職場專職照顧幼兒。因此，此階段政府的意識型態傾向右派政黨：當資本主義與父權主義有衝突時應先以家庭照顧為主，暫離職場，女性還是以生育子女為主，行有餘力才進入勞動力市場。

2016年之後新增的政策不多，主要是希望透過《準公共托育計畫》提供更多托嬰服務，藉由大量提供公共托育托嬰資



源，補助私立托育機構以降低送托成本；或補助親人照顧的方式，鼓勵家庭找尋補充性照顧資源，讓婦女不用因為生育而中斷工作。依作者分析：《準公共托育計畫》是一項將育兒成本「去市場化」的概念，也充分展現執政者身為左派政黨強調福利大政府的意識型態。而在準公托計畫背後的意識形態代表的是：女性可以選擇不需停下腳步育兒，而以自我發展為主。也認同母職是可以取代的，所以大量設置公共托嬰設備，以取代母職的角色，抑制托嬰托兒市場化，以增加女性繼續就業的動機。本階段另外一項值得注意的政策，在於「去家庭化」的政策趨勢，經過2019年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及之後各項政策的配合，也展現出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去家庭制度的主張，維持左派政黨的特色。

就最新的趨勢來看，在2024總統選舉中，雖然在選前有一波本土ME TOO事件，但整體而言性別政策並未成為攻防的議題；主要的政見在於家庭政策的差異。國民黨總統參選人的政策提出成立少子化基金，支持女性凍卵補助，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調升至投保薪資全薪，三胎以上家庭補助100萬元，可用於購屋、換屋頭期款及租屋；及提供青年購屋頭期款等政策。基本上，意識型態保持在維持家庭結構，但支持（或妥協）女性工作發展需求的路線。民進黨的候選人則將《人工生殖法》列為優先修法，提到目前該法僅異性戀夫

妻適用，但各界對於放寬對象多有討論，暗示開放同性婚姻者適用的可能性。延續上一任同黨政府支持同性婚姻的政策，持續以解構傳統家庭制度為路線。

但是，此時在政府福利角色上已開始「左右混淆」了。挑戰的在野（右派）政黨提出60～65歲補助全民健保費用（有所得限制，仍然為選擇性福利）（註2）；執政的左派政黨不再跟進，強調只補助弱勢老人。如同國外政黨一樣，雖然對於政府在福利提供的角色上原始的靈魂是相同的，但是當家當知當家苦，對於福利的提供的意識形態已開始模糊，不再堅持福利大政府路線。

綜觀臺灣過去的女性勞動政策，以新增政策做分析，在2000年前及2008-2016的政策主要是希望婦女同時能夠兼顧工作與家庭，然而當兩者有衝突時，仍以傳統家庭中照顧者的角色為主，其次才考量到工作；女性進入公共政策的規劃中，仍然是以「母親」的角色為主。而2000～2008年間婦女勞動政策則是單獨以「女性」為工作者的角度去思考，而非一個母親，希望以社會投資型的計畫協助女性在職場上有所角色及發揮，也確實有助於女性從家庭的依賴者轉為獨立公民之角色（註3）。2016年之後，去家庭化及去母職化的政策走向，使得左派政黨的痕跡更為明顯。

## 陸、結語

在全球化經濟模式之下，企業對於勞工條件愈趨彈性的要求更加強烈，為了維持企業願意落腳國內，許多國家對勞工保護都比過去更趨於妥協。但另一方面面臨少子化的壓力，國家必須拿出實際作為，以解決日漸增多的勞動女性不願意生育之問題，而危及國家長遠人口平衡、勞動力供給及家庭照顧功能瓦解的問題，福利國家都面臨了合法化及資本累積兩難的衝突中（O'Conner, 1973）。

Lewis（2010）提到在全球化下，照顧工作漸漸去家庭化，轉變為政府與市場的角色，而女性在全球化下就業及權利的情況確實有所改善，但在家庭照顧的負擔上卻沒有太多的改變。Lewis修改自己過去Male Breadwinner理論，Jane Lewis（1992）曾經提出“Male Breadwinner Model”，並且將所有福利國家分為包括“Strong Male Breadwinner Model”、“Modified Male Bread-winner Model”、“Weak Male Breadwinner Model”等三類型，但Lewis（2010）在最新研究中也承認福利國家有所改變，傳統的男性養家制度已無法涵蓋目前家庭的實際狀況，而雙薪家庭的崛起讓原本以男性養家為主的家庭型態受到很大的刺激，同時讓國家在支持家庭角色上起了不同的作用。Lewis（2001, 2010）認為女性在西方國家中已

經扮演半個養家活口者的角色，女性必須漸漸習慣自己是工作公民的模式（worker citizen model），隨著女性成為工作者模式的形成以及家庭制度的改變，福利國家也面臨新的挑戰。

由過去臺灣在婦女政策的發展上可以看出左右派政黨意識型態對於婦女政策的發展重點有所差異。從政黨的婦女政策內容，是可以看出每個政黨對於女性該在家庭中應扮演的角色是有其特定影像的；也可以看出政黨的價值觀認為女性的角色應該以當媽媽為主，還是以當資本主義下勞動力為主。換言之，隨著政黨的替換，家庭的型態、女性的角色可能有所不同。

在家庭政策上左右派政黨的色彩相當顯著，但是在勞動政策上除了2000至2008年一波特殊以女性為主的勞動政策外，女性就業的政策重點一直沒有改變過（見表1），顯然無論在左派政黨或右派政黨的眼中，女性仍然是勞動力市場中產業後備軍的角色。因為只強調女性「再就業」的政策背後的意識形態，明顯的是女性必須完成了媽媽角色之後才能在成為工作者，也不管女性中斷職場再度就業對女性所造成的折損效果，而鼓勵女性「再就業」也是為資本家尋找次級勞動力，讓二度就業的婦女能夠填補資本主義發展下低階低薪勞動力的需求而已。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婦女運動者進入政府角色所帶來政策的不同，2000-

2008年由於許多當時從事婦女運動者進入政府擔任部會首長，而提出許多專門協助女性發展職涯的政策，女性勞工首次不是以「母親」的角色進入政策，而是首次以「女性」的角色成為政策的主角。然而這樣以女性為主的勞動政策取向，隨著臺灣婦女運動的式微，在後續政黨輪替中消失了。所以，以女性為主體性的政策取向，可能並不存在臺灣現有的主要政黨中，與左派或右派政黨無關。也許必須如

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見解及Korpi等人（2009）的研究一樣：女性必須參與國家機制，才有可能成為政策的主角，使國家成為解決女性困境的武器。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關鍵詞：**婦女政策、政黨政治、福利國家、福利政治經濟學、臺灣

## 註 釋

- 註1 現代職場中的社會保險雖然規定薪資較高者需要繳交較高的保費，但是相對的雇主及政府所貢獻的保費比例也更高，未來在領取失業津貼或退休金時可以由保險系統領到的金額也較高。換言之，透過這項福利的設計，職場中的社會保險將使得薪資越高者，得到更多的報償，而使低薪者獲利較少。
- 註2 所謂選擇性福利，指受益者必須接受資產調查，在限定的收入及不動產下才能享有此項福利，非全民皆可享用。
- 註3 Lister（2003）提到公共政策習慣將女性視為依賴者的角色，女性必須以太太或女兒之男性依賴者的身份取得福利，所以女性並未得到完全的公民權，只被視為一半的公民。當公共政策以女性為主體去思考（而不是以母親的身份，或太太的身份去取得時），女性才能算是擁有完整的公民權。

## 參考文獻

- 陳芬苓（2021）。〈社會投資觀點的性別分析——以臺灣女性創業方案為例〉。《國家發展研究》，21（1），93-129。[https://doi.org/10.6164/JNDS.202112\\_21\(1\).0003](https://doi.org/10.6164/JNDS.202112_21(1).0003)
- 唐文慧、王宏仁（2004）。《社會福利理論：流派與爭議》。巨流。

- Beveridge, W. (1942). *The Beveridge report: 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ocial service*. HMSO.
- Bryson, L. (1992). *Welfare and the state*. Macmillan.
- Chen, F.-L. (2000). *Working women and state policies in Taiwan: A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Palgrave. <https://doi.org/10.1057/9780230508873>
- Chen, F.-L. (2014). Beyond Beveridge: Analysis of the recent family policies in Taiwan. R. K. H. Chan, L.-R. Wang, & J. O. Zinn (Eds.), *Social issues and policy in east Asia: Family, aging and work* (pp. 25-40). Cambridge Scholars.
- Dean, H. (2016). The socialist perspectives. In P. Alcock, T. Haux, V. McCall, & M. May (Eds.), *The student's companion to social policy* (5th ed., pp. 79-85). Wiley Blackwell. <https://doi.org/10.1002/9781394260430.ch12>
- Ellison, N. (2016). Neoliberalism. In P. Alcock, T. Haux, V. McCall, & M. May (Eds.), *The student's companion to social policy* (5th ed., pp. 61-66). Wiley Blackwell. <https://doi.org/10.1002/9781394260430.ch9>
- Esping-Andersen, G.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olity.
- Esping-Andersen, G. (2009). *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 Adapting to women's new roles*. Polity.
- George, V., & Wilding, P. (1994). *Welfare and ideology*. Hertfordshire.
- Goodman, R., & Peng, I. (1996). The East Asian welfare states: Peripatetic learning, adaptive change and nation-building. In G. Esping-Andersen (Ed.), *Welfare states in transition* (pp. 192-224). Sage.
- Gough, I. (197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 Macmillan.
- Hernes, H. (1989). Women and the welfare state: The transition from private to public dependence. In A. S. Sassoon (Ed.), *Women and the state: The shifting boundaries of public and private*. Routledge.
- Holiday, I. (2000). 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 Social policy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tudies*, 48(4), 706-723. <https://doi.org/10.1111/1467-9248.0027>
- Huber, E., & Stephens, J. D. (2000). Partisan governance, women's employment, and the social democratic service stat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3), 323-342. <https://doi.org/10.1177/000312240006500301>
- Korpi, W. (1989). Power, politics, and state aut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itizenship: Social rights during sickness in eighteen OECD countries since 193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3), 309-328. <https://doi.org/10.2307/2095608>
- Korpi, W., Ferrarini, T., Englund, S. (2009, May 11-12). *Egalitarian gender paradise lost? Re-examining gender inequaliti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welfare state* [Paper presentation]. EMPLOY-FAMNET Workshop, Berlin, Germany.
- Lewis, J. (1992). Gend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elfare regime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 2(3), 159-173. <https://doi.org/10.1177/095892879200200301>
- Lewis, J. (2001). The decline of the male breadwinner model: Implications for work and care. *Social Politics*, 8(2): 152-169. <https://doi.org/10.1093/sp/8.2.152>
- Lewis, J. (2010). *Work-family balance, gender and policy*. Edward Elgar.
- Lister, R. (2003). *Citizenship: Feminist perspectives*. NYU.
- MacDonald, M. (1998). Gender and social security policy: Pitfalls and possibilities. *Feminist Economics*, 4(1), 1-25. <https://doi.org/10.1080/135457098338536>
- Morel, N., Palier, B., & Palme, J. (2012). *Towards a social investment welfare state? ideas, policies and challenges*. Policy. <https://doi.org/10.2307/j.ctt9qgqfg>
- O'Connor, J. (1973).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Transaction.
- Pascall, G. (1997). *Social policy: A new feminist analysis*. Taylor & Francis.
- Pascall, G. (2012). Ch2: Understanding gender in welfare states. In M. Daly (Ed.), *Gender inequality and welfare states in Europe* (pp. 34-53). Policy. <https://doi.org/10.4337/9781788111263.00007>
- Pierson, C. (1991). *Beyond the welfare state?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welfare*. Polity.
- Sainsbury, D. (Ed.). (1999). *Gender and welfare state regimes*. Oxford University.
- Saraceno, C. (2015). A critical look to the social investment approach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 Society*, 22(2), 257-269. <https://doi.org/10.1093/sp/jxv008>
- Siim, B. (1990). Women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C. Ungerson (Ed.), *Gender and caring. Work and welfare in Britain and Scandinavia* (pp. 80-109). Hemel Hempstead.
- Titmuss, R. M. (1974). *Social policy: An introduction*. Unwin Hyman.
- Walby, S. (1986). *Patriarchy at Work: Patriarchal and capitalist relations in employment*. Polity.
- Walby, S. (1990). *Theorizing patriarchy*. Basil Blackwell.
- Wilson, C. (1977). A model of insurance markets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6(2), 167-207. [https://doi.org/10.1016/0022-0531\(77\)90004-7](https://doi.org/10.1016/0022-0531(77)90004-7)
- Wong, J. (2006). *Healthy democracies: Welfare politic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Cornell University.